

大家好。

全国青年理事会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呈现了一场公众参与式剧场演出。我们在演出后获知，此活动与戏剧盒最近呈现的参与式剧场《一堂课》的模式十分雷同。全国青年理事会在活动举办前没有通知或征询戏剧盒的同意，直至活动结束后我们才被告知他们模仿了《一堂课》的呈现方式。全国青年理事会行政总裁蔡大卫于 2017 年 9 月 6 日通过面簿向戏剧盒致歉（附件 A），我们也于 2017 年 9 月 7 日给予回复（附件 B）。

随后，我们于 2017 年 9 月 8 日以及 19 日与全国青年理事会针对此事展开进一步的对话。在此函中，我们会摘录对话要点，并同时提出我们对此事的反思。

戏剧盒—全国青年理事会会议摘要

2017 年 9 月 8 日会议出席者

- 1) 许慧铃（副艺术总监，戏剧盒）
- 2) 郑家颖（剧团经理，戏剧盒）
- 3) 蔡大卫（行政总裁，全国青年理事会）
- 4) 郑春鸿（副行政总裁，全国青年理事会）
- 5) 克里斯托弗·帕嘎萨姆（理事长（青年联系），全国青年理事会）
- 6) 苏炳铤 副理事长（青年联系，全国青年理事会）

附注：李邪（《一堂课》创作者）因故缺席，她已授权慧铃和家颖在会议上传达她的意见。

2017 年 9 月 19 日会议出席者

- 1) 郭庆亮（艺术总监，戏剧盒）
- 2) 蔡大卫（行政总裁，全国青年理事会）
- 3) 郑春鸿（副行政总裁，全国青年理事会）
- 4) 克里斯托弗·帕嘎萨姆（理事长（青年联系），全国青年理事会）

在会议中，全国青年理事会同意他们的职员在没有通知与征询我们同意的情况下改动了《一堂课》是不恰当的。我们澄清说戏剧盒向来都欢迎大家分享点子和实践手法，《一堂课》是戏剧盒一直都愿意分享的重要作品。然而，事件的发生恰恰反映了全国青年理事会对艺术工作者、其创意过程和艺术作品的不尊重。因此，我们在会议中重申以下重点：

1) 每一个艺术创作都是艺术家呕心沥血后的成品。这些作品具有明确的目的，其理念与所采用的方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创作的过程耗时费力，经过一再评估与修改，才呈现在观众眼前。最终的成品是不可轻易被复制的。例如全国青年理事会改编自《一堂课》的青年活动就没有达到活动的目的，反而让出席者观后一头雾水。

2) 一位熟练的艺术实践者和一名活动组织者是有区别的。活动组织者若缺乏相关的技能与经验是无法假设自己能在艺术实践者不在场的情况下独立创作的。同样的，艺术实践者若对相关课题一无所知，他也无法创作出一个既达到目的又引人注目的作品。若活动组织者和艺术实践者携手合作进行创作，二者各有所长，看问题的视角亦有不同，这有利于他们合作的课题讨论。

全国青年理事会认同创作艺术作品背后所需付出的时间、精力与专业知识。对于所犯的错误，如违背参与式剧场的理念、在过程中对艺术家与各群体造成伤害，他们已致歉并愿意负起责任。他们亦承诺再也不会任何活动上呈现“*For Your Consideration*”。

全国青年理事会也澄清无意让他们的职员成为“艺术实践者”，但希望未来能够和艺术家合作一起策划与创作活动项目。他们认同许多艺术家可以创作出能够真正吸引参与者的节目。他们愿意与艺术家们进行对话或让艺术家为其职员主办工作坊，从而帮助他们了解如何让观众真正参与活动，如何进行协作，共同策划活动。除此，也让他们明白活动参与方式背后的理念。

我们的深层反思

近几年，许多机构（特别是政府机构）把艺术当作一种接触公众或方式有趣、老少咸宜的传达信息的手段。例如论坛剧场近几年来在学校和政府机构非常受欢迎。

戏剧盒就收到许多政府机构的邀约，帮忙将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以论坛剧场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对论坛剧场特别青睐，因其互动性让他们觉得这种方式比较有趣，也不会让公众觉得信息是被强灌的。他们对这类剧场形式认知的狭隘恰恰反映了他们对此类艺术创作的不了解。

在创作过程中，社会参与式艺术不仅仅把焦点放在建立关系，也提供一个批判性的透视镜让观众去检视相关的课题。其目的是为了打开心扉，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而不是将信息大力鼓吹。这是一种民主运作方式，尝试营造一种社会和文化关系，让处身其中的人们能够具批判性，若价值观契合可学习如何合作，若价值观不同可学习如何共存并体谅异己。诸如此类的艺术实践是为了促进来自不同文化与处于不同交叉点的人们进行对话。其互动性旨不在“好玩有趣”，而是一种“召唤”策略，邀请观众有所“反应”以进行对话，从而进行学习与探索。

若政府机构要使用社会参与式艺术来处理某课题，他们必须清楚知道其结果不在于传达观点而在于打开对话并培养能力，例如处理冲突的能力，以及处理信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此事件也揭露人们对艺术创作过程缺乏认识。除此，时有所闻艺术家被告知他们的收费过高，有的则要求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一部新作品。也有艺术家被要求修改其作品以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

艺术家，就如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经年累月的修炼以精进技能。他们辛勤地进行研究和探索以磨练他们的技艺，不断地寻找别出心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独特的想象力。这一切是需要时间、纪律和苦干的。他们的作品不只是单凭一时的灵感。看似有趣简单的作品，背后的复杂是难以想象的。看似困难的作品也可以是激动人心的。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情理兼具，物质与精神并存。

当艺术家被要求免费工作或低廉收费，这低估了他们作品的价值，也反映提出此要求的人不懂艺术的价值。所以问题是，我们需要进行多少艺术教育以让人们明白和珍惜艺术和艺术家？

这起事件以及其他对艺术家与其作品不尊重的事件，涉及政府机构，他们通过委任或合约聘用独立艺术家或艺术团体。

讽刺的是，全国青年理事会隶属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而拥护艺术与艺术家则是此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恳切的希望全国艺术理事会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能够扮演积极的角色，向其他政府机构，包括隶属于其部门的机构，提倡艺术和艺术创作的真正价值。

我们也恳请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探讨，如何教育公众保护个体与团体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最后，我们要衷心感谢事后那些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感谢你们的支持、爱与关怀。我们也很感谢全国青年理事会行政总裁蔡大卫先生即时联系我们以纠正错误，并诚恳的与我们进行对话以尝试解决问题。我们希望类似的对话与其他积极的举措能够继续进行，假以时日，我们之间的信任才能够重建。

戏剧盒艺术总监
郭庆亮启

附件 A：全国青年理事会行政总裁蔡大卫的致歉贴文

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david.chua.9083/posts/10155434580096013>

日期：2017 年 9 月 6 日

李邪、庆亮、慧铃，大家好。

我是全国青年理事会的行政总裁大卫。我刚获知事情发生的原委，我们的团队在未经许可下借用《一堂课》的创意，这是对原创作的尊重，对此，我想向你们致以万二分的歉意。对于戏剧盒与其合作伙伴在艺术与社会空间影响这个领域中的优秀作品我们予以尊重，我们还有很多可向艺术群体学习之处，例如如何使用这些艺术形式与新加坡年轻一代针对复杂课题进行深度与实质的对话与交流。我已经和我的团队沟通过了，但对他们的过失与对你们造成的伤害，我难逃其咎并愿意负起责任。我们因急切寻找能够与年轻人沟通的新方式，结果匆忙将所学付诸行动，未事先征询戏剧盒及其合作伙伴的同意。我们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请接受我们的道歉。

我会继续跟进此事件的后续发展，并希望有机会与戏剧盒团队进行对话。我期望未来全国青年理事会能够与不同的艺术团体进行协作，共同策划有益于年轻人的精彩活动。

蔡大卫启

Li Xie Koh Hui Ling Kok Heng Leun Jean Ng Jalyn Shese 韩 Han Xuemei Jia Ying Tay

附件 B：戏剧盒艺术总监郭庆亮的回复

来源：<https://www.facebook.com/kok.leun/posts/10155648553917856>

日期：2017年9月7日

全国青年理事会于星期一举办了一个青年活动。在未征询戏剧盒同意的情况下，他们采用与戏剧盒参与式剧场《一堂课》相同的模式举办活动。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事后告知。全国青年理事会行政总裁蔡大卫已通过面簿道歉，以下是本人的回复。

大卫，你好。

谢谢你的面簿贴文。但与此同时，我不得不对你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事件缺乏了解而深感失望。

首先，让我针对分享我们的作品表达观点。戏剧盒向来都欢迎大家分享点子和实践手法，《一堂课》是戏剧盒一直都愿意分享的重要作品。我们不太在乎著作权或所有权，而是重视作品的意图和关键过程。

我不明白你在贴文中所谓的“匆忙将所学付诸行动，未事先征询戏剧盒及其合作伙伴的同意”是什么意思？

全国青年理事会未通知戏剧盒就使用《一堂课》的模式，更别说是征询意见。那你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向谁学？在哪里学？几时学？我知道你的职员曾出席《一堂课》的演出，观后还感到很兴奋。若是因为观看了《一堂课》而因此“学”到了让观众参与的方法，这样的学习质量令人质疑。一个致力于和年轻人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机构，怎么可以以如此轻率的态度理解与学习建立关系的过程？因为看到与观众接触的手法既新颖又有效而兴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此而相信自己可以不清楚《一堂课》体现的批判精神而依样画葫芦，这样的做法是傲慢的，要不就是无知的。《一堂课》是由一群很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历经一年多的耕耘所创作出的作品。他们经历了一段既深刻又关键的过程，从而设计出有意义、具挑战性、发人深省的作品，因此这部作品才会得到巨大的反响。

但最让人遗憾的是，全国青年理事会制作的活动中不但没有包容差异和多样性的精神，反而鼓励偏见和歧视。

以下是全国青年理事会提供的说明：

“参加活动的青年会被置于一个设想的未来情景当中，他们是某住宅区的部分居民，因为一些好处而选择迁居到其他区域。但这个选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由于此地区重新规划，无法容纳现有的所有家庭。“被遗忘”的四户家庭有：

- 1.法拉-拥有两个小孩的单亲家庭。
- 2.格蕾丝-目前单身但曾在海外与同性伴侣结婚。打算回国并希望领养小孩并在本地建立家庭。
- 3.阿标-单身年长者。
- 4.珍妮丝-新婚无小孩，刚毕业并开始工作。

在这个预设的情境中，居民决定不要凭借建屋发展局的抽签系统来决定这些家庭的命运。这几户家庭也将决定权赋予居民，他们清楚知道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机会获得新房子。

这些居民的任务是达成共识，从四户人家中选择淘汰一户，因为新地点只剩下三套房子。”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为活动设定的背景似乎意味着有孩子的异性夫妇就无须参与这个残酷的选拔系统，进一步巩固他们是唯一可被接受的家庭单位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设定这样的背景进一步裁定这四户家庭是非主流的，可被随时替换与被遗忘的。因此，他们理应流离失所因为他们不符合主流标准。

此外，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场景的设定是傲慢的，因为它隐含着这样的信息：既然还有三套空着的房子，那这四户家庭是幸运的，因他们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机会获得新住房。

最后，那些投票的居民，若他们不懂得质疑这些最基本的假设，就会被误导似乎自己在帮助这些家庭，而事实是，他们参与了一项安抚与劝解的运动。

如果这确实是一个公民参与项目，那全国青年理事会似乎是在利用这个方式加强或宣传以下想法：非主流家庭在新加坡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在过程当中完全没有对话的机会。

我们感到难过的是，全国青年理事会模仿了《一堂课》的手法，但却违背了其初衷。《一堂课》创造空间让对话进行，从而互相理解，进行协商，让每个人有机会发言，并包容多样性。他们的做法是对作品的创作初衷、参与创作的艺术家的不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活动鼓励人们对年长者、单亲父母、没有生育的夫妻和同性恋的偏见和歧视。在你的贴文中所谓的伤害，不仅艺术家感受了，那些“被遗忘”的家庭更是受害者。

我为这件事深感难过。类似的事件屡次发生：顺手牵羊，盗用他人的创意却不注明出处等等。若公众参与是这些机构想倡导与达到的目的，那他们应该先学习如何尊重公民的权益：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自由以及他们的梦想。

我期待着你对这件事的进一步澄清和想法。

谢谢。

庆亮启